

〔目〕 富谷至／著 刘恒武／译 黄留珠／校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
书写材料的文化史

甲骨、青铜、石材、砖瓦、简牍以及纸张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书写材料的世界，在这一交错缠联的体系中，简牍与纸张一样，属于一种普遍性、日常性的信息载体。以二十世纪初敦煌和居延等木简的发现为肇始，简牍逐渐成为历史研究视域中一个舍辉四照的焦点。经过百年累积，中国各地发现的简牍总数已达数十万枚之巨，字书、法律文书、诏令、契约、账簿、历法、信札等内容各异并且形式有别的木简与竹简，为我们构筑起一条触摸、认知古代中国的时间隧道。

〔日〕富谷至／著 刘恒武／译 黄留珠／校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
书写材料的文化史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祁小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 (日) 富谷至著 刘恒武译 黄留珠校.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ISBN 978-7-01-006072-9

I. 木... II. ①富... ②刘... III. 简(考古)—研究—中国 IV. K87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423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6-3466 号

MOKKAN, CHIKUKAN NO KATARU CHUGOKU KODAI

by Itaru Tomiya

©2003 by Itaru Tomiy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2003.

This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7

b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Iwanami shorten publishers 授权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MUJIAN ZHUJIAN SHUSHUO DE GUDAI ZHONGGUO

作者: (日)富谷至 译者: 刘恒武 译校: 黄留珠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www. peoplepress. net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0. 2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0, 001-3, 000 册

ISBN 978-7-01-006072-9 定价: 30.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中译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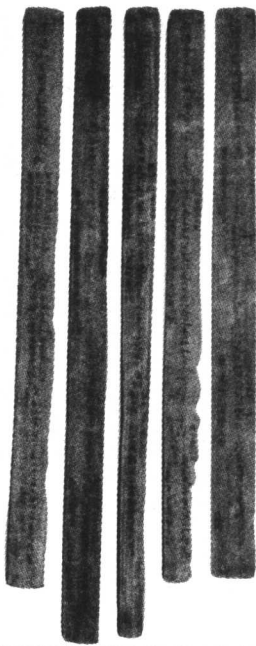
黄留珠

在当今日本治东洋史的学者之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富谷至教授是相当杰出的一位。他对中国法制史、简牍学等均有精到的研究，著述甚丰，建树颇多，堪称学术界领军式的人物。现在，他的力作《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以下简称《古代》），由宁波大学文学院刘恒武博士译为中文，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及译者约我为该著中译本写篇序言，盛情之下，不敢推辞。现谨就我之所知，特别是拜读后的一些直感，略陈如下，以供广大读者参考，并与此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共讨论。

《古代》作为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推出的“世界历史丛书”的一种，于2003年7月29日出版。该著有副题曰《书写材料的文化史》，由此更清楚地表达出全书的主旨。以我之拙见，觉得此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视角新颖

历史研究，如何捕捉新的视角，对史实做出不同以往的解释，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都尽力以求的事。在这方面，《古代》一书提供了具有启迪意义的范例。该著用文化史的眼光，对秦汉时代确立和实行的文书行政，做了别开生面的考察。其紧紧围绕上起战国下至魏晋书写材料演变的主线，着重探讨了这种变化与国家行政的互动



1996年出土长沙走马楼
三国吴简



嘉峪关魏晋墓饮宴壁画

关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书写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行政体系，一旦书写材料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就会受到影响，从逻辑上讲，它甚至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变化。在简牍基础上展开的汉帝国的行政，与纸张时代的唐代的政治之间，是必然有区别的。”像这样一种学术考察的角度，以前实不曾有过。而如此一种小处入手、大处着眼、以小见大的研究路数，也是值得称道的。

二、研究精细

大家知道，研究简牍，一般地说主要是简牍文字释读，据简文内容进行分类，以及简的编年等。日本学者大大突破了这种常规的研究格局，从简牍形态、样式、书式、字体，甚至简牍材料质地等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的地方入手，进行精细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古代》一书可以说集中而典型地展现了日本学者这种精细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书中在广泛综合日本学术界自大庭修到泷山明、吉村昌之等几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亦充分展示了作者本人的独到研究成果。例如关于书籍简与文档简的区别，关于古代书籍成书经过的说明，关于简册编绳编法及收卷方法的论述，关于木简与竹简的区别，关于文书的界定，关于隶书的解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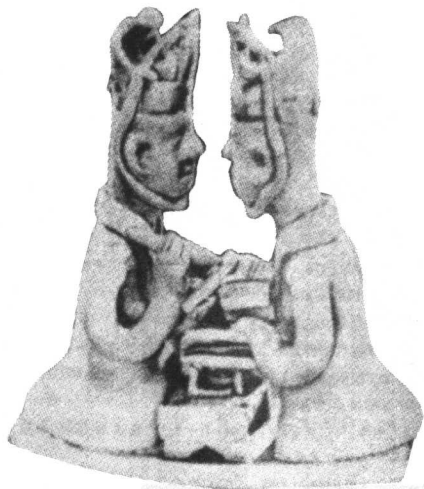


嘉峪关魏晋墓奏乐壁画

等，都体现了令人钦佩的研究精神。特别是对于人们所熟知的诸如秦帝国的“书同文”、孔子的“韦编三绝”等史实的解读，更是体现了作者善于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本领，凸显了其研究问题的精细。

三、雅俗共赏，图文并茂

《古代》虽为一部学术著作，但文字生动，深入浅出，章、节之间环环紧扣，衔接自如，且颇具艺术色彩。把艰深的学术问题，如此娓娓道来，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看懂，并感兴趣，做到雅俗共赏，没有高超的学术驾驭能力和深厚的研究基础是难以做到的。据我所知，富谷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书籍文化的研究，用力于古文书学的考证。2001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流沙出土的文字资料——以楼兰、尼雅文书为中心》一书（京都大学出版社），应该说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收录在此书“研究编”中的他的论文《3世纪至5世纪书写材料的变迁》，以及发表在同年《东方学报》（京都47）上的姊妹篇《晋泰始令之成立》，实际上为《古代》一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正因为有了如此的学术积累，所以《古代》一书才能够运用娴熟，“治大国若烹小鲜”，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另外，全书还配有一百多幅图版。这些图版或进一步补充、完善书中的文字说明，或作为图示将抽象概念具体化，或直接构成书籍内容的一部分。如此图



西晋校书陶俑

文交融，图文并茂，大大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

当然，如果从其他角度做审视，对《古代》一书肯定还会做出别样的认识或概括。不过，在我看来，上述的三特点却尤其值得体察与重视。

关于《古代》中译本的译文，也很有些特色，需要说一说。外文的中译，历来有直译与意译两种译法。实际上，这二者各有优劣。完全直译，难免生硬，有悖汉语表达习惯；完全意译，则容易走样，有失原文风貌。所以最佳的选择，应该是将两种译法有机相结合。《古代》的中译，基本遵循直译，但也适当结合意译，既显现了原语种的韵味，又避免了过分的生硬感，处理得比较好。特别是对日语当用汉字的翻译，恰到好处，突出反映了译者熟练掌握日、汉两种语言的能力和所具备的丰富历史、考古专业知识。

最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册《古代》中译本所隐含的一种特殊情结。具体说，应该叫做西北大学校友情结。原来，《古代》作者富谷教授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在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做研修学习，二十年后又受聘为西北大学海外兼职教授。《古代》中译本译者，原是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后赴日本深造，获博士学位。而我本人，研究生亦毕业于西北大学，并一直在这所学校供职任教。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与《古代》一书的作者、译者，均为西北大学的校友。他二人之所以嘱我为中译本作序，主要也当出于这种校友的情缘。所以，《古代》一书的中译本，实际上正是西大校友间的一次愉快而成功的学术合作。尽管我与《古代》作者分属不同的国家，与译者分处不同的省区，但西大校友的情结却始终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不难预料，以这种西大校友情结为纽带，今后我们还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继续进行有效的学术合作。

2006年2月26日草讫于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

目 录



西晋砖画：采桑

中译本序 1

第一章 关于纸的发明 1

从高中课本谈起 纸与蔡伦 古纸的发现
纸的用途 “纸”这一名词的出现和造纸的开始

第二章 纸以前的书写材料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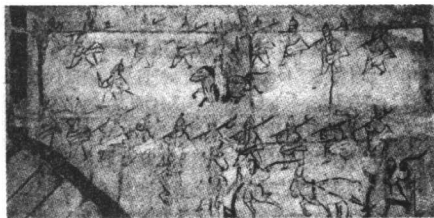
甲骨和青铜器 凿刻于石材上的记录
石刻的起源 秦刻石 刻写诏书 汉碑时代
东汉时期石碑的盛行 墓石风潮所意味的碑
和碣——石刻的名称 墓碑的起源和形状
墓中的石刻——墓志 刑徒墓砖 黄泉国的石
刻 书写材料里的石刻

第三章 木简和竹简 35

20 世纪的新资料 木简发现史 木简研
究史 简牍——形状和用途 不同的收卷方法
(一)——书籍 不同的收卷方法 (二)——
帐簿 书籍诞生的前夜 单简 木简和竹简
发现带来的困惑——为什么日本仅出土木简

第四章 简牍述说的书写世界 64

简牍资料的魅力 四维的资料 长屋王木
简和长屋亲王宫 文字的统一 被推翻的定
论 所谓的文字统一——从文献史料和出土资
料两个视角来看 李斯和文书行政 从篆书
到草书——简便性和艺术性 文书行政 (一)



西晋砖画：屯垦

——诏书 地方行政·军事组织 从中央到肩水候官 元康五年册的原貌 文书行政（二）
——上报文书 书记官及其相关问题 字书为谁而作——从流沙出土的资料谈起 文书传递
——两种检 文书传递——邮亭 文书行政的贯彻执行——邮书刺、邮书课、邮书举

第五章 楼兰出土的文字资料——

木和纸的并用 103

再谈书写材料 斯文·赫定与楼兰王国 纸制书籍 来自楼兰的书信 木和纸的分用——簿籍 检·符和公文书 向纸的逐步过渡

第六章 由汉到晋——由简牍到纸 123

由文献史料看文书装帧 走向纸的时代——诏的纸色 黄纸和黄籍 总结——书写文化的变迁 向新的行政体系转换 何谓律令制

后记 142

原著图版出处一览 146

引用简牍说明 149

中文版后记 150

译者跋 152

第一章 关于纸的发明

从高中课本谈起

纸 (paper) 发明于中国, 8 世纪传入伊斯兰世界, 以后又传入欧洲, 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造纸术的西传缘起于公元 751 年唐帝国与伊斯兰大食的战争。根据伊斯兰方面的史料, 被俘的唐军士兵中有造纸匠人, 他们在造纸技术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 纸在中国何时、如何被发明? 首先来看一下目前日本高中使用的世界史课本的表述:

(1) 在秦汉时代, ……纸被发明, 取代了从前木简、竹简, 在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后来这一技术被传至西方各国。

Y 社 1993 年

(2) 东汉的蔡伦改良造纸术, 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D 社 1997 年

(3) 当时是在竹札、木札上进行书写的时代, 大量的行政文书以竹简、木简的形式出现。……东汉的蔡伦找到更简便的材料, 制成了经过改良的纸, 而纸的实际普及则是进入 4 世纪以后。

S 社 1999 年

(4) 书写文字的材料, 经历了由甲骨、金属器到石材的变迁过程, 到了战国时代, 又转变为木简、竹简和绢布。2 世纪初, 蔡伦改良了发明



安阳殷墟出土刻辞卜甲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殷八师”

于西汉末期的造纸术，为纸的大量生产开辟了道路。

N社1997年

(5)到汉代为止，文字记录一直书写于木简、竹简之上，东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蔡伦又对其进行改良。

T社1999年

以上是五种教材对于纸在中国产生过程的阐述。读过之后，一方面我们会觉得它们之间呈露着微妙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会觉得各种表述中存在着含混不清的暧昧之处以及易生歧义的句子。

例如，阅读比较(1)、(4)、(5)的阐述，必然会出现一个疑问，纸的发明究竟是在“秦汉时期”、“西汉末期”，还是“东汉时期”，哪一个应该是正确的？另外，如果阅读例(4)的解说，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文字的书写材料沿着甲骨→金属器（一般是青铜器）→石材的轨迹不断变迁，在战国时期过渡到木简和竹简。如此推论，写在木简、竹简（总称“简牍”）的文字，最初是写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事实上，在石、骨和青铜器等书写材料上记录着的只是一些特定内容的文字）。

在有关造纸的阐述中，一定会出现蔡伦的名字。然而在这里，各种课本言及“改良造纸术”，却未说明所谓的改良是由什么状态做了怎样的改良。例(4)称“为纸的大量生产开辟了道路”，事实果真如此吗（未见佐证史料）？例(2)称“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那么具体贡献又是什么？

在现行高中课本有关纸的发明及其影响的阐述中存在着以上疑问，在修订教材的时候，这些问题应该被指明并且得到修正。必须指出，这样的问题会引起学生的知识混乱，甚至会导致谬误的流传。

纸与蔡伦

关于蔡伦和纸的关系，在范曄（公元398—445年）编纂的《后汉书·蔡伦传》以及被认为是东汉时期分数次编纂的《东观汉记》中都有记载：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后汉书·蔡伦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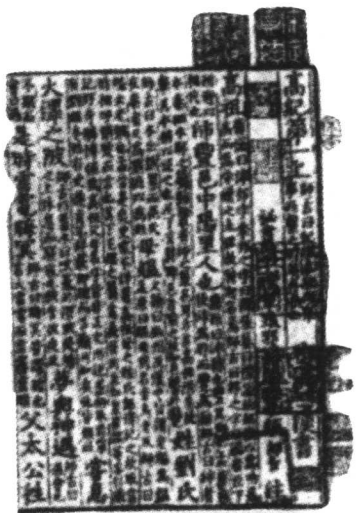
意为：古来文字多是写于编缀起来的竹简之上。或以缣帛为书写材料，称其为纸。缣昂贵而简厚重，两者都不方便。蔡伦用树皮、破布片、麻和渔网等造出了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将其进献给皇帝。汉和帝高度评价了蔡伦的才干，自此纸也被广泛使用，因此天下均称之为蔡侯纸。

黄门蔡伦，典作上方，造纸，所谓蔡侯纸也。

《艺文类聚》杂文所引《东观汉记》

意为：黄门蔡伦，供职于上方（尚方），制造出纸，即所谓蔡侯纸。

基于这样的史料记载，从前都是以蔡伦制纸为造纸的嚆矢，并将蔡伦视为纸的发明者。《后汉书》居正史之列，历来被誉为信史。《东观汉记》则编纂于东汉时期，至晋代（公元265—420年）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书中亦有《蔡伦传》，根据唐代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所言，《蔡伦传》是由崔寔等人于桓帝时期（公元146—167年）撰成。这就意味着，它是在公元105年蔡伦进献蔡侯纸之后仅仅40—50年里编纂而成的，可以说是同时代的记述。



影印宋景祐刻本《尚书》



图 1

基于如此的原委，直到最近，蔡伦还保持着作为纸的发明者的历史地位。在笔者的高中时代——上世纪 70 年代，这段知识的确也是这样被讲授的。可是，仅仅十年之间，教科书的记述就由“发明”变成“据传发明”，进而变化为“改良”，蔡伦作为纸的发明者的声誉被剥夺殆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各地考古调查中，发现了时代早于蔡侯纸的古纸。

古纸的发现

早于蔡侯纸的纸最初是在 1933 年被发现的。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rdin）为队长的中瑞联合考察团的中方成员黄文弼，在被称为土垠的罗布泊北岸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方宽 4 厘米、长 10 厘米的纸的残片^①。关于这片后来被称为罗布泊纸的古纸属于什么时代，可资考证的是同一遗址出土的 70 余支汉简，其中包括有纪年为河平四年（公元前 25 年）、元延五年（公元前 8 年）、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的简牍。汉代的烽燧与当时立国于此的楼兰王国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楼兰被纳入汉帝国的支配体系是在汉昭帝时期（公元前 87—公元前 74 年），当时汉朝廷派遣傅介子暗杀楼兰王，更其国名为鄯善，并在当地设置伊循都尉。汉朝对楼兰的经营以西汉时期为最盛，甚至出土木简的文字里还发现有“伊循都尉”一语，因此，将这批出土汉简的年代定为西汉末期应该无误，同时出土的古纸也应视作西汉遗物。

遗憾的是，罗布泊纸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战火中化为了灰烬。所以，关于它是否真的是纸，即能够满足“纯化植物纤维制成纸浆，再用竹屛滤水，使纤维素交织其上形成薄片”这样定义的纸（Paper），就不得而知了。

二战结束十二年后的 1957 年，在西安市东郊灞桥镇发现了一座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40—公元前 87 年）的古墓，那里出土了一片古纸^②（图 1）。

^①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1948 年版，第 168 页。

^② 田野：《陕西省灞桥发现西汉的纸》，《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 7 期。

1964年和1965年分两次对这片古纸用显微镜进行了分析,判明它是以大麻(*Cannabis sativa* L)为主要原料间杂少量麻(*Boehm-eria nivea* Gad)制成的植物纤维纸^①。将这片实物仍存的灞桥纸定为西汉时期,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但是,在此还应关注灞桥纸的出土状况,根据考古报告的介绍,与古纸同出的三面铜镜,为三弦钮(钮的部分有三条弦纹),其背面分两层铸出精巧的纹饰,正面有布纹,同时残存有几块布片,纸附着于铜镜和布,似以丝状纤维制成,纸上还留有布片的纹样^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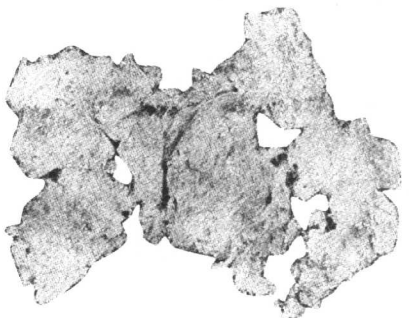
从罗布泊纸到灞桥纸,由点到线,轮廓变得愈来愈清晰的西汉时代的纸,不久又成为一个面,其存在的真实性得到进一步确定。下面介绍四项相关考古发现。

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大量木简(居延汉简)的地点。1973年和1974年,其中的A32遗址(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两片麻纸^③(图2)。被命名为金关纸的这两片纸的其中一片——纸Ⅰ(EJT1:011),卷作团状,展开之后约有21cm×19cm大小,呈白色,质地均一,一面光滑,另一面起毛,具备纸张细密强韧的特性。根据显微镜的分析,纸里含有大麻纤维。

另外一片,纸Ⅱ(EJP30:03),11.5cm×9cm,呈暗黄色,类似粗糙的坑边纸(一种产于浙江省的厚蕈纸,主要用作便纸、包装纸),有麻筋、丝头,状似拆散的麻布块。

在纸Ⅰ出土的地点还发现了大量木简,其中时代最早的属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就纸Ⅱ而言,其出土地层不晚于哀帝建平年间(公元前6—公元前3年)。总之,可以说两者都是蔡侯纸以前的纸。

在金关纸发现六年之后的1979年,河西走廊的汉代烽燧遗址又一次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纸,遗址地点位于今敦煌市西北95公里、东经93度45分、北纬40度21分的疏勒河沿台地^④(图3)。



上图2

下图3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168页。

②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78—81页。

③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

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上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4—1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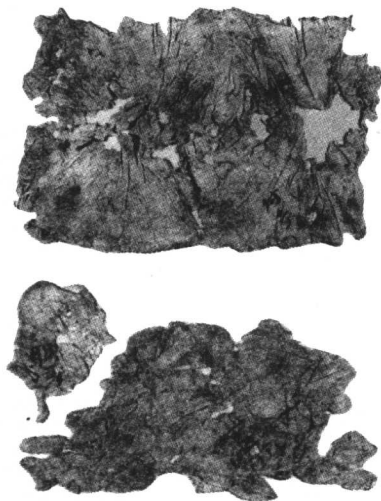


图 4

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下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134页。

②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2期。

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5期;柴生芳:《敦煌汉晋悬泉遗址》(日文),富谷至编《边境出土木简的研究》,朋友书店2003年版,第161—204页。

该地点后来被编号为遗址 D21, 并被称为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 在 20 世纪初斯坦因 (Stein) 的调查中被遗漏。这里出土了多达一千二百支的木简, 而且, 从同一遗址的四处探方中, 发现了五片纸 (标识号码: T12: 047, T10: 06, T9: 025, T2: 018 两枚)。均为麻、大麻纸, 尺寸最大者为 32cm × 20cm (T12: 047)。白色、一面平滑、一面粗糙, 是其共有的特征。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和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对马圈湾出土的纸进行了科学分析, 其详细结果载于《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①, 就马圈湾纸的时代而论, 因为同一地点还出土有汉元帝时期 (公元前 49—公元前 33 年) 至王莽时期 (公元 8—23 年) 的木简, 故推定其年代不应晚于蔡侯纸。

1986 年 3 月, 在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发现了十三座秦墓和一座汉墓, 汉墓器物之中有一幅纸质地图^②, 置于坑内死者的胸上, 仅存残片, 长 5.6cm、幅 2.6cm, 泛黑的纸上绘有山、河、道路等图形。根据其他伴出的随葬品, 该纸的年代被推定为西汉初期文景时代。

就有关纸张的最新考古发现而言, 还必须述及 1990 年至 1991 年河西走廊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大量古纸。

悬泉置遗址位于通往敦煌市的公路干道沿线, 位于东经 95.2 度、北纬 40.2 度, 面积达二千三百平方米, 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置 (驿传)”, 即传送邮书的设施。西汉武帝至魏晋时代, 该设施历经五次扩建, 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二万支简牍 (木简) 以及同时发现的古纸^③ (图 4)。在此之前发现的古纸至多不过四五片, 而悬泉出土的纸的数量接近五百片, 使人叹为观止。根据发掘报告, 写有文字的纸有十片, 其中西汉昭帝时期的地层里出土三片, 宣帝至成帝时期的地层里出土四片, 还有二片属东汉时期, 一片属晋代。

根据发掘报告，昭帝时期的古纸上写的文字都不过两字，有“付子”、“薰力”、“细辛”等，宣帝、成帝时期的古纸则有“持书来/口致畜夫”的字样，东汉时期的纸上发现有“巨阳大利上缮皂五匹”。

以上介绍了从1933年发现罗布泊纸到1990年发现悬泉置古纸为止的有关西汉纸的考古概况。那么以目前所知，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纸的用途

首先，在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造纸（蔡侯纸）以前，纸（Paper）就已经出现，这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纸在中国制造的最早年代，比蔡伦的时代至少要早一百年至一百五十年。早期教科书上关于蔡伦发明纸的记述，逐渐遭到怀疑，蔡伦由发明者“降格”到改良者，其原由也恰恰在于最近的考古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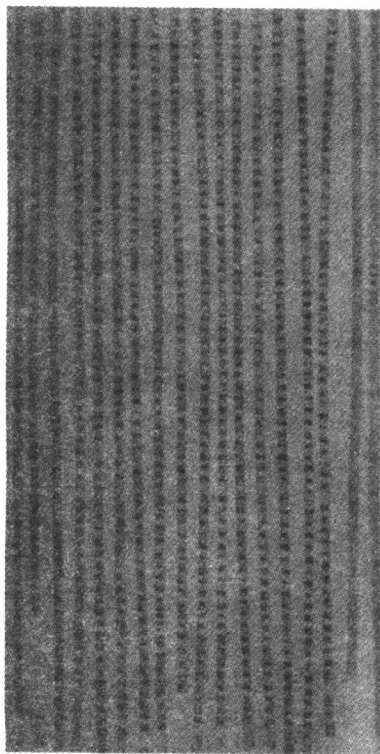
那么，《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又当如何解释？潘吉星在其著作《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强烈否定了蔡伦造纸说，避而不谈《后汉书》的记载所具有的意义，他的意见或许可以说代表了当今学界的大势。

的确，在蔡伦之前，纸就已经存在。然而，对于认为《后汉书》的记载没有如实反映史实而加以封杀的做法，笔者不敢苟同。概观出土的西汉古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纸究竟是不是用于书写文字的物品，即作为书写材料而存在的“纸”？蔡伦以前的时代，人们是否将书写功能视为纸的第一用途？

在水天出土的地图上，的确绘有线条，却未书写文字。确认有文字的仅是悬泉置出土的纸，其中可以断定为西汉纸的不过七片。悬泉置遗址出土纸的总数多达



悬泉置出土西晋纸文书残片



《仪礼·士相见》木简

五百片，绝大多数是无字纸。为何无文字的白纸如此地大量存在，如何对其进行解释。进一步说，一片纸上书写的文字区区可数，而且是倾斜地写在纸的中心。如果是作为书写材料的纸，文字的数量和书写的位置则令人费解。将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就会怀疑悬泉发现的纸是否真是作为书写材料来使用的。就记者的看法而言，这些纸张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书写材料而备置的。虽然不能排除那些空白纸是未使用的书写材料的可能性，但是，将它们看作是出于书写之外的使用目的而准备的东西会更加自然吧。

那么，西汉时期的纸的用途是什么？推测范围内可能性最大的，大概是其作为包装材料的功能。无可否认，帛、布等物品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为囊——包装材料，植物纤维纸也可和它们一样用于包装。上文言及灋桥纸的出土时，曾希望读者留意有关报告提到，灋桥纸是附着于布和铜镜出土的，由此来看，它很可能原本用于包裹铜镜。

悬泉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也是一样，“付子”、“薰力”、“细辛”都是药品的名称，可以推测，该纸可能是用来包裹药品的^①。其证据是，上述文字本来只写有二字，而且写在纸的右下，恐怕包装之后其位置恰好就移到了表面可以看到的地方。

以上介绍了有关西汉纸的考古发现。在文献史料当中，也有若干关于蔡侯纸以前古纸的值得注意的记载，如果仔细探讨的话，亦会得出纸最初用于包装的结论。

在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礼典》卷五十八里引用了东汉郑众《百官六礼辞》，这本书记载了婚姻等六种典礼仪式的程序，其中有如下记述：

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帛囊，著篋中，又以帛衣篋表讫，以大囊表之，题检文言，

^①猪饲祥夫：《甘肃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的纸和药名》（日文），《汉方临床》47卷第6号，2001年。